

1917—1920的新文学

姜玉琴 著

肇始与分流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1917—1920的新文学

姜玉琴 著

肇始与分流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肇始与分流: 1917—1920 的新文学 / 姜玉琴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60-5635-0

I. 肇… II. 姜… III. 新文学 (五四) — 文学研究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311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郑秋君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5 1 插页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写在前面的话

肇始与分流：1917—1920 的新文学

顾名思义，《肇始与分流：1917—1920 的新文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新文学史，而是一部把新文学发生期最初几年的理论肇始和代表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

目前以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类似命名的专著已有不少，如果继续沿着以往那种面面俱到，即把人们都熟知的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实一一罗列出来，但却难以展开深度阐述的方式来写，似已没有太大的必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对新文学的肇始、发展以及流变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所能找到的建国前和建国后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书籍都翻阅、细读了一遍。在感叹前辈学者和同代学人披荆斩棘之功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作为同一条路上的后来者，有责任为本专业领域加一块砖、添一块瓦。当然，时至今日，这种“加”与“添”不应该是数量上的，而应该有某种“质”上的区别。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我没有把本书的写作定位在“大”而“全”上，而是紧紧围绕着“深”而“新”这一轴线来做文章。就本人而言，在研究方面，我历来有溯本求源的癖好。坚定甚至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开始的某些结论就是模糊、不确定的，甚至与文学的真实状况是有所偏离、甚至悖逆的，那么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研究也是难以信赖的。

《肇始与分流：1917—1920 的新文学》的论述重点是集中在理论的创建方面。除了鲁迅与易卜生、鲁迅与尼采那两部分有特殊的考虑外，其他的章节基本都没有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撇开作品，谈理论的创建，主要是深感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是理论早于文本，即先有舆论导向，后有文学摹本。《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被称之为新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是发表于 1918 年。不但在时间上晚了三年，重要的是，鲁迅之所以肯从古书堆中抽身而出，转向新文学的创作主要是受到《新青年》的激励，甚至连《狂人日记》这篇无论是对鲁迅本人还是对整个新文学而言都异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陈独秀再三约稿、催促的结果。另外，标志着中国新文学正式确立的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是成立于 1921 年。而此时以陈独秀、胡适与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理论界已完成了一个探讨周期，进入了另一个分化、转向和融合的发展阶段。

如果不了解新文学创始时期的理论导向以及看似相同，实则有深刻差异的理论文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后的创作以及转向问题。这也是本书所着重谈的第二个问题，即分流问题。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把中国新文学的初期理论分成了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两个理论原点，认为他们的理论主张分别代表了新文学发生期的两种不同建设思路和发展模式。后来的“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两大创作阵营的形成、对峙与发展，虽然有着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是如果从文学思想的继承性上来考察的话，无疑可以把这两大流派看作是陈独秀、胡适艺术思想的承担和实践者。换句话说，中国新文学中后来所产生的一切恩怨纠纷——为政治还是为艺术的分歧，实际都能在他们两人那里，也就是在新文学初始理论中找到对峙的根源。另外，我认为新文学在最初的三年创建中（1917—1920），便以二比一的优势（陈独秀、周作人与胡适的分歧）选定了文学为“人生”，也就是为特定的阶层——“平民”服务的道路。这个结论意味着中国新文学理论在创始、奠基时期就与文学为谁服务，即文学要依附于服务对象的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无疑，这一价值判断与以往其他的文学史本、研究成果大都把“五四”文学笼统地归结为个性主义、浪漫主义的习惯做法有所区别。我期待着大家的批评与指正。

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许多的成果，但在已成定论的结论中似乎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我们习惯把“五四”文学标示为“人的文学”，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强调的那个“人”成为划分新、旧文学的一个本质性标准。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也就是习惯上被我们阐释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中的“人”是如何落户于中国文学的呢？笼统而惯例说法是，这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文学借鉴的结果。但是这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似乎还缺乏更为深入的讨论。周作人在写《人的文学》的时候正是狂热地追踪、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种信仰和精神状态下所写出的“人”，怎么可能是如朱自清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如果不是，中国“五四”文学中的“人”该如何界定？中国“五四”文学的性质该如何界定？还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后，中国新文学为什么会发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大转变？仅仅是“救国”压过了“启蒙”吗？

再者，还有陈独秀，这位中国新文学中最早倡导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凭借手中的宣传阵地——《新青年》为新文学的出笼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几乎所有有关文学改良的重要文章和新文学的作品都是通过他的手面世的，为什么在谈论起“五四”文学形成的背景时，我们却总是有意无意把这位关键性的人物一再忽略，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而没有人站出来说“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谈论鲁迅与尼采、易卜生的关系。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以往学者的研究，多半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迅与俄国作家的关系上，而对与鲁迅有更为关键性联系的尼采，特别是易卜生的涉猎不是太多。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人物，他的艺术观念、文学思想的渊源到底来自何方，这关系到如何理解新文学精神的指向标问题。出于“寻根”的考虑，在这两章中主要采用了作品与作品、人物与人物相对照的方式，开采、还原出鲁迅对上述两位作家思想的接收脉络。这与鲁迅是否剽窃没有关系，一个作家能从根本上把代表人类思想高度的东西吸收、整合到其思想宝库中，并最终将其融合到自己的血与肉中，与自我、与民族化为了一体，这与剽窃有什么关系？网络上有人在“鲁迅——史上被捧得最红的剽窃者”的标题之下，把我所发表的相关文

章列在其下，作为对鲁迅剽窃之观点的旁证。这样做，把鲁迅研究庸俗、低级化了。

在鲁迅研究中的另一种相反倾向是，不能指出其作品中的一些思想渊源。好像一旦指出来就影响了鲁迅伟大的独创性形象。其实，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彻底的原创性思想？尼采的上帝死了，一切要重新估价的思想，如果要细致追踪其渊源的话，恐怕一直要溯源到古希腊文化中。指出这一点，难道有损于尼采的形象吗？人类思想就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巨大网络，鲁迅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创作着落在当时人类思想所能抵达的最高峰。仅凭这点，他就无愧于“伟大”二字。本专著把鲁迅的创作与外来作家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进行考察，主要是考虑到新文学的“原型”问题，即中国新文学中最早的人物形象的魂灵是来自何方，这对认识整个新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写作的时间跨度较长，部分内容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次在对全书的整理过程中对这部分内容又作了统一的修订。这本书的出版，既是对自己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也是标志着下一步研究工作的起点。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1

上 编

第一章 导论

- 一 对文学史重写的再思考 / 3
- 二 1917—1920：“重写”的学理基点 / 8
- 三 相关概念与写作方法的说明 / 17

第二章 《新青年》与新文学

- 第一节 《新青年》：一份影响深远的刊物 / 22
 - 一 依仗实力：从上海迁往北京 / 22
 - 二 大权独握：一份“私人”刊物 / 26
- 第二节 从“新青年”到“新人” / 30
 - 一 “新青年”：何种范式的人 / 30
 - 二 “种”的退化与“人”的重塑 / 32
 - 三 “新人”：人性与兽性的合一 / 35

第三章 陈独秀文学思想的来源

第一节 法国启蒙思想与文学观念 / 38

- 一 面向法国：接受与传播 / 38
- 二 面向文学：准则的由来与形成 / 43

第二节 “进化论”与文学史观 / 47

- 一 接受“进化”：过于偏至的理论武器 / 47
- 二 解读“革命”：迂回地切入文学本体 / 50
- 三 解读“文学”：思潮意义大于文本价值 / 53
- 四 解读“通俗”：弃“神”而重“人” / 56

第四章 彷徨与抉择

第一节 奠基期的理论分歧与选择 / 59

- 一 1917—1920：理论的发轫、探讨及初步形成 / 59
- 二 “革命”大旗下的两大“改良”派系 / 61
- 三 学术还是政治：文学改良意见的分歧 / 63
- 四 阵营的分裂：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 / 66

第二节 国民文学与“国民性” / 70

- 一 创作范式：国民文学 / 70
- 二 围绕“国民性”的两种创作 / 73
- 三 最后抉择：文学大众化 / 77

第三节 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 / 81

- 一 “富贵的人”：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划分 / 81
- 二 平民与人：一个假设的价值等同 / 88

第五章 反思与检讨

第一节 “人”与“非人”：本体论上的一次认识失误 / 94

- 一 悖论：个人主义与群体本位主义 / 94
- 二 “人”的发现：农民与工人 / 98

三 误读：文学价值与“阶层” / 103

第二节 对前期理论的检讨 / 107

一 文学革命转向政治、文化革命 / 107

二 文学无目的性与贵族精神 / 111

三 整理国故与重提易卜生主义 / 116

下 编

第六章 关于“新文学”

第一节 诞生与发展 / 123

一 考证“新文学”一词 / 123

二 新文学、新文学史的确立 / 128

三 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 130

第二节 演变及特征 / 133

一 由朦胧、含混到明晰、确立 / 133

二 偏离与回归“新文学” / 135

三 “新”的含混中共同使用的称谓 / 138

第七章 放弃与皈依

第一节 一个最为费解的文学“符号” / 143

一 依附于狭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 / 143

二 现实主义的发生与传播 / 146

三 超越文学：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 / 150

第二节 从西欧到苏俄：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追随 / 152

一 关注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 / 152

二 《小说月报》、《新青年》介绍的作家、诗人 / 157

第三节 皈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163

一 “两代”作家的碰撞 / 163

二 转向：茅盾与前期创造社 / 165

三 犹豫与接受：鲁迅与“革命文学” / 169

四 认可“唯物史观”的内在契机 / 172

第八章 继承与错位

第一节 直线奔跑的现实主义 / 176

一 人生与人生观改造 / 176

二 进化论与正确的世界观 / 181

三 阶级论与现实主义 / 186

第二节 两套不同的话语：胡风与鲁迅 / 191

一 胡风：独尊世界“进步文艺”传统 / 191

二 鲁迅：从未独尊现实主义 / 196

第三节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再认识 / 199

一 评估：“左翼”的理论体系 / 199

二 理论文本：现代与反现代 / 203

第九章 鲁迅与易卜生

第一节 《国民公敌》与“反庸众”思想 / 211

一 选择《国民公敌》 / 211

二 “少数人”与“多数派” / 214

三 “独异”与“庸众” / 217

四 平常人·国民性·其他 / 220

第二节 《狂人日记》与《国民公敌》	/ 224
一 1906—1909：最喜欢的作家易卜生	/ 224
二 故事、人物及结局	/ 227
三 从欧洲的“勇士”到中国的“狂人”	/ 231

第十章 鲁迅与尼采

第一节 “狂人”与“超人”：两种不同的文化喻体	/ 237
一 “狂人”：新文学中的一个“原型”	/ 237
二 “超人”思想与鲁迅的小说	/ 240
三 “狂人”：中国化的“超人”	/ 244
第二节 “摩罗”精神：新文学的起点	/ 248
一 魏连殳：另一个“狂人”形象	/ 248
二 求缺不求圆的美学风格	/ 251

参考文献 / 255

索引 / 261

上 编

肇始与分流：1917—1920 的新文学

第一章

导 论

一 对文学史重写的再思考

对新文学研究而言，198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刊物都先后开辟了讨论专栏。在这一呼声中出现了不少“重写”的成果。就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这些成果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扩大学科的研究范围，即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史”的纵向发展、延伸与衔接上；^①二是注重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个案”分析。走的是在重写文学史之前，先重写作家、作品与局部的迂回之路。^②在新时期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之间，还曾出现过一批给五四“文学革命”以及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学启蒙者“翻案”的文章。^③这次行动主要是完成了对意识形态介于并规定文学模式的颠覆——在恢复了“五四”文学革命本来面貌的同时，也使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学启蒙者得到了应有的史学地位。遗憾的是，由于这次行动把研究重点过于集中在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上，忽略了对胡适、周作人等人理论主张的深度挖掘与阐释，从而没能使这一原本极有价值的“重写”思路融会到重写文学史的大

① 在这方面以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以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自1988年第4期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为标志。1989年第6期是该专栏的最后一次讨论。此后，改为不定期的发表有关文章。

③ 如朱德发的论文集《“五四”文学初探》在这方面颇下功夫。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肇始与分流：1917—1920 的新文学

潮中来。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前面所说的两种曾获得学界广泛认同、赞许的文学史观，也渐渐露出了自身的不足。近些年来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回落，实际上就是新奇的体验不再新奇之后，面对前方的路，不知该怎么办的茫然反映——在找不出更新的对策之前，只能以沉默来对之。其实，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寻找突围的路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突围”，丝毫没有怀疑、否定任何已有学术成果的意思。相反，一切“突围”思想雏形的凸显，都与受这些充满生命活力的理论启发有关。我试图做到的，就是借用这些曾对我们学科建设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方法的反思，来为自己的论述打开一扇“天窗”。

我认为，文学史重写的关键，不应是无限度的延伸其上界与下限，也不仅是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某一文学事件重新给个评估与说法。这些因素自然都属于“重写”的范围，但说到底，它们并不是“重写”的逻辑基点。这两种“重写”方式，一个使新文学摆脱了以政治事件为标界的零碎切割；另一个使“个体”对象获得了应有的深度。可是，对于一个相对完备的文学史观，或文学史专著而言，除了要有相应的时空概念（上界与下限），以及众多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之外，更重要的，还必须要有个能把这个框架体系支撑起来的理论“支点”，即它能为某一历史时空内的“为什么文学发展正好必然要走上它已经走上的这一特定方向”^①，提供出有力的阐释依据与合乎逻辑的文化背景。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先生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时曾提出，文学史观是“对一段时期的文学史的重新评价，归根到底就是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②依据文本来判定、解读文学史，也恰如王瑶先生所主张的“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③的价值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些“个体”，也就是所主张的要以“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态度去评价”^④作家、作品的批评基准是什么？他们认为，“只要真正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⑤

① 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8页。

②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③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④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⑤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化》1988年第4期。

我相信对于敏感的研究者来说，真诚地面对研究对象，相信自己的阅读体验，必将会得出一些新颖、独到的结论。可是在重写文学史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面前，除了需要有敏锐的感觉与心灵体悟之外，可能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理性的价值认识，即能够把这些零散的作家、作品统一到同一部文学史中的共性标准。换句话说，一部新文学史中包孕有上千、上万部作品，如果缺少一个可供参考的、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将怎么评价它们？一部作品一个标准吗？王富仁先生在1996年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①一文中，针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曾提出一个“学术基点”问题。^②我想这一诉求中大概就包含有对共性标准的要求。

当然，陈思和与王晓明先生在开辟专栏之时，并没抱有要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的雄心壮志，而是低调地说，我们想做的“只是澄清以往文学史研究中的那些混淆和错觉，……是为那种历史的审美的文学史研究，为那种研究能够在将来大踏步地前进，作一些铺路的工作。”^③假若说他们二位所采用的这种暂且回避宏观的“‘重写’的主观构造”，而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弄清楚”^④的重写方式，还无须明确亮出自己的史学观的话，那么当以专著的形式来演绎文学史时，就无论如何也回避不掉了。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部受到广泛好评的文学史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的代表之作。本书是以“现代化”，即“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⑤作为梳理新文学的框架支点的。把代表着不断往前发展、进步的“现代化”作为重写文学史学理基点的优势是，抓住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初进入角色转换，即从“古典”过渡到“现代”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弊端是，“现代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美学标准。换言之，用一个代表着不断突飞猛进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要求与规范文学史，必将会出现文学史观与发展现状互为脱节的窘况。因为，文学与文学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

①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② 王富仁主张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把鲁迅作为建构现代文学学科框架的基点。该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③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④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⑤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